

《齐民要术》的历时传播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传播学视角的初步分析

党晓虹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9)

【摘要】《齐民要术》的传播是其得以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机制。然而,对其传播史的整体性研究却付之阙如。本文基于传播学的视角,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厘清《齐民要术》的传播轨迹、动因、内容、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承载的重农思想、丰厚而实用的农业知识与技术、“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形式多样的传播媒介不仅使《齐民要术》被后世农书大量引录,还对海内外的农业生产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传播主体的精英化、传播方式的口语化也制约了《齐民要术》的精准传播乃至推广应用。

【关键词】《齐民要术》;历时传播;“五W”模式;文本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1-0024-11

Diachronic Sprea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i Min Yao Shu*

——A Preliminary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DANG Xiao-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Qi Min Yao Shu* is a key mechanism which can exert grea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holistic study of its communication history is lacking. This paper clarifies *Qi Min Yao Shu*'s dissemination track, motivation, content,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deolog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rich and practica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he powerful push from top to down, and various form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not only make *Yaoshu* quoted in the agricultural books of later generations, but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same time, the elitism of the dissemination subject and the colloquialism of the communication method also restrict the accurate dissemination and even the application of *Qi Min Yao shu*.

Keywords: *Qi Min Yao Shu*; diachronic spread; “5w” model; text analysis method

一、问题的提出

大约在公元6世纪30年代或更晚一些^①,曾担任过高阳太守的北魏人贾思勰编撰《齐民要术》(以

[收稿日期] 2018-04-25

[基金项目] 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一般项目“基于引文的《齐民要术》农业知识扩散研究”;青岛农业大学齐民书院项目(QM201605)

[作者简介] 党晓虹(1975-),女,博士,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史研究。

① 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

下简称《要术》)一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该书分 10 卷,92 篇,系统总结了北魏以前及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的农业科学技术。该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与重视,历代中央政府、地方官员、文人学者、乡村缙绅乃至一些来华的外籍人士纷纷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并大力推动其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后世农书也多以此书的编写体例为典范,它对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献信息的历时传播是指文献信息在不同时代的人之间传递、交换、共享的过程,是一种时间序列上的纵向信息传递过程^①。《要术》的历时传播则是实现永恒价值、奠定其世界农业史重要地位的关键机制。史料表明,至迟在唐代,《要术》已以手抄等方式被载录于历史典籍之中并得以流传,此后其传播历代不辍,甚而对东亚农业技术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尽管近现代以来学界对《要术》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尤其是近 20 年来,对该书语料价值的挖掘成果斐然,但是,对《要术》的传播这一重要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却付之阙如。本文基于传播学理论,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梳理《要术》历时传播的轨迹、动因、内容、效果,探究制约其有效传播的影响因素,以期丰富《要术》研究方法,拓展《要术》研究领域,并为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传播乃至推广提供历史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要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要术》在中国古代农学乃至世界古代农学发展史上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故自其问世以来,研究者筚路蓝缕、大家辈出。近百年来,无论是研究方法抑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更是远超前人。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具有开拓性质的民国时期。书名解读(万国鼎,1928)、版本校释(栾调甫,1934;西山武一,1944)、农具应用(陶希圣,1936)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局部的、单纯的农业耕作基础研究是其主要特征。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前二十年的活跃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技术挖掘与应用(万国鼎,1956;石声汉,1957;游修龄,1957)、农业生产关系探析(李长年,1959;王仲莘,1961)、版本校释(石声汉,1957;梁家勉,1957)等方面,出现了“东万”“西石”“南梁”“北王”等大家,但研究整体上仍属于基础性研究,还未上升到较深的理论层面。三是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后期的发展期。除了版本校释(天野元之助,1978;缪启愉,1982;杨直民,1983)之外,经济管理思想挖掘(王思明,1990;惠富平,1997)、饮食文化解读(肖克之,1996)、农业哲学与思想探讨(方立天,1979;张波,1980)、农谚典故整理(倪根金,1998)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入挖掘是其重要特征。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21 世纪。民族史探讨(李根蟠,2001;王玲,2003)、比较研究(李根蟠,2003;崔德卿,2012;韩忠志,2015)、语料价值挖掘(蒋绍愚,2001;汪维辉,2006)、社会史(王福昌,2013)、数字化研究(周广西,2008)、整体性研究(孙金荣,2014)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论据、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上的突破。

纵观《要术》学术史,可以发现:在研究内容上,学界主要从版本校释、农业技术、农业哲学、农业思想、农业经济、饮食文化等多元视角,对《要术》进行深入解读。其中,石声汉先生对中国古代农书包括《要术》的演进以及传播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但并未对《要术》的历时传播进行专门性的探讨;在研究视角上,相关研究缺乏规范而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缺乏传播学理论的介入,导致难以深刻揭示《要术》历时传播的动因及基本规律;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研究偏重于对《要术》的质性分析,难以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文本内容分析法起源于新闻传播领域,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其客观性、非接触性、揭示性使其在分析文献时具

① 王京山:《论文献信息的历时传播》,《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有天然优势^①。因此,本文试图将传播学理论与文本内容分析法引入到《要术》的传播史研究之中,以期实现《要术》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理论框架:“五 W”传播模式

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其中,“谁”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说什么”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是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对谁”,就是受传者或受众。受众是所有受传者如读者、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效果”,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见图1)。拉斯维尔试图用“五 W”模式反映人类传播的一般基本过程,由此开创了后来传播学研究的五个基本内容,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



图1 “五 W”传播模式

然而,在运用“五 W 模式”对《要术》近 1500 年的历时传播进行分析时,必然面临史料的难以获取以及部分受传者(主要为农业生产者等)反应的无法观察等条件约束,同时考虑研究的目的与价值,本文对“五 W 模式”进行了适当修正,重点考察《要术》历时传播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效果四个方面(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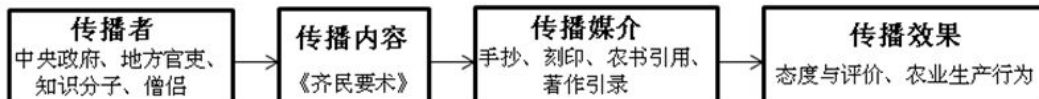


图2 《齐民要术》传播模式

此外,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具有过程性和系统性的双重特征。所谓过程性,指的就是信息传播的基本过程,强调信息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流动过程;系统性指的是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简单流动,而是在传播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影响下,执行信息传递功能的有机整体,是一个传播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要研究传播,既要考察传播的过程,又要了解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外在的影响因素。作为传播过程的经典理论“五 W 模式”,仅能揭示《要术》的传播过程与特征,却无法剖析制约其传播的外部影响因素,因而,本文还将传播学的系统观纳入进来,考察《要术》传播的影响因素,以期对《要术》的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

三、基于“五 W 模式”的《要术》历时传播及其过程分析

一般而言,经典文本往往经历较长历史时段的传播并发生种种变迁,以传播学通常采用的共时传

^① 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96-110.

播研究方法,无法探究出其全部的传播轨迹与传播效果^①。因而本文基于“五 W 模式”,重点考察《要术》的历时传播及其过程。

(一)手抄、刊印以及后世农书:形式多样的传播媒介助推《要术》历时传播

1.手抄、刊印——《要术》文本传播最主要的方式

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已发现的《要术》所有版本,学界没有找寻到唐以前有关《要术》刻本的任何凭证,但在唐代长孙无忌等撰写的《隋书》卷 34《经籍志》中明确记载“《齐民要术》十卷,贾思勰撰”。在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的《旧唐书》卷 79《列传第二十九·李淳风传》中记载“李淳风演《齐人要术》”,而唐末《四时纂要》一书中大量引用《要术》中的相关材料。依据上述事实,可以推断,《要术》的传播至少在唐代是存在的,且全靠手抄流传。

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在宋仁宗的授权下,由当时的皇家藏书馆崇文院正式刊印《要术》,并颁发给各地劝农官员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这个本子大概可以算是《要术》的祖本。因为主要是颁发给各地农官的,可以想象,其刻印的数量是有限的,刻本在民间流传的可能性也较小,手抄依然是《要术》文本民间传播的主要形式。关于这一点,宋代大史学家李燾在《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的序文中做了详细说明:“本朝天禧四年,诏并刻二书(指《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以赐劝农使者,然其书与律令俱藏,众勿得习。市人辄抄《要术》之淡近者,摹印相师,用才一二。”^②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曾先后担任浙江上虞令、九江郡丞,龙舒太守的张麟,偶然之间从友人处得到一本天圣年间刊发的《要术》,并将之刊板成书,这也是《要术》的首部私家刻本。清中晚期,黄丕烈、朱述之、张绍仁、劳格等人先后对张麟本进行过校对,1821 年四家校本合集刊发,流传至今。

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术》的刻本当属 1524 年由明代侍御马直卿在其治所湖湘所刊印的湖湘本,其后所刊发的无论是 1603 年(一说 1605 年)胡震亨、沈士龙二人编撰的《秘册汇函》^③抑或 1630 年(一说 1635 年)毛晋所编撰的《津逮秘书》中关于《要术》的辑录,都是以马直卿的湖湘本作为原本。由于多次翻刻,尤其受到明末盛行的对刻书的随意篡改及作伪之风的影响,《要术》的明代刻本特别是《秘册》《津逮》中大量出现错字、脱空、墨钉、错简、脱页,甚至是臆改、删削等严重弊病,受到后世学者的诟病,胡立初评之为“疮痍满目”,杨守敬更是毫不客气地指斥为“卤莽如此,真所谓刊刻之功,不蔽其僭妄之罪。”^④但尽管毛、胡刻本错误百出,却并不妨碍两书长期占据《要术》传播的统治地位^⑤。除了刻本之外,明代还有以南宋张麟本为原本的《要术》的手抄本,与明代刻本广被诟病不同的是,其手抄本抄写精好,没有脱页和错页,没有一处涂抹和勾乙,虽然也有一些错字脱文,但整体质量还是相当好的。1922 年、1930 年和 1936 年,其抄本先后被《四部丛书》《万有文库》及《国学基本丛书》收录并排版印刷。

明以后,《要术》没有出现新的刻本,但出现了众多对明代坏本的校勘本和译注本。1804 年(一说 1806 年),张海鹏因“湖湘本昔人尝以删削抵之,《津逮》本又多脱文讹字,为之废书而叹者屡矣”^⑥,遂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校之以黄延鉴录示的《农桑辑要》中所引诸条,刊刻了活字本的《学津讨原》。1927 年,《四部备要》根据此本刊行。1875 年,湖北崇文书局将《津逮秘书》本《要术》校勘刊印。1888 年,吕调阳在其编纂的《观象庐丛书》一书中,将《津逮秘书》本《要术》经过校勘后收录其中。1896 年,

① 田义贵:《经典文本的变迁与历时传播——以〈红岩〉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6 年第 3 期。

②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18,中华书局,2011 年。

③ 缪启愉认为,此书刊行于 1603 年,而肖克之则认为,此书刊发于 1605 年。

④ [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 7,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

⑤ 1823 年上海博古斋影印出版此本,1875 年崇文书局据此本刊印,1888 年《观象庐丛书》中的《要术》以及 1915 年《百子全书》本均为此本传系。

⑥ [清]张海鹏:《学津讨原》,广陵书社,2008 年。

袁昶以明嘉靖《湖湘》本、《津逮》本、《学津讨原》本和朱述之的过录宋本为底本,刊刻《浙西村舍丛刊》,但遗憾的是,仅校勘了《要术》的前七卷。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即是此本附以句读的铅印本。1917年,郑国勋编辑《龙溪精舍》丛书,其中所收《要术》即是以《浙西》本为底本,采用高山寺残本和《太平御览》本校刊。1979年,台北广文书局出版的《诸子荟要》中所收的《要术》即是此本的影印本。此外,刘寿曾、刘富曾、吾点、张定均、张步瀛、丁国钧、黄麓森等人也先后对《要术》进行过校勘,但他们所校稿本大多没有出版,对《要术》的传播影响不大,在这里不再赘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遗产整理受到重视,《要术》的整理与校释成为学界热点。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石声汉的《齐民要术今释》,及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缪启愉的《齐民要术校释》是其中最璀璨的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了梁乐、许蕙翻译的《齐民要术》白话版,这对于《要术》在民间的普及是大有裨益的(见表1)。

表1 《齐民要术》文本国内传播的主要轨迹

传播时间	传播者	传播方式
唐	不详	手抄
北宋	中央政府、各地农官	官方刊印
南宋	张麟	私人刻印
明	马直卿、胡震亨、沈士龙、毛晋	私人刻印
	不详	手抄
清	张海鹏、黄丕烈、 朱述之、张绍仁、 劳格、袁昶、刘寿曾、刘富曾、	校勘
民国	吾点、张定均、张步瀛、丁国钧、黄麓森	校勘
新中国	郑国勋、唐晏、倪澄瀛	校勘
	石声汉、缪启愉、	校释
	梁乐、许蕙	白话版

不只在中国,日本、德国等海外地区也能找寻到《要术》文本传播的印记^①。《要术》文本在日本的传播始于9世纪,891年(唐昭宗大顺二年),日本学者藤原佐世将日本所藏传世汉籍编纂成《日本国见在书目》一书,其中记录有:“《齐民要术》十卷,丹(高)阳贾颢思(思颢)撰”。这表明《要术》早在唐代就已传至日本。虽然雕版印刷技术这一时期已从中国传至日本,但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雕版印刷的记载,因此,我们推断,《要术》在日本的传播最初也是依靠手抄。总体来看,《要术》在日本的抄本众多^②,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手抄本当属1166年根据京都高山寺所藏北宋崇文院刻本抄录的仁安本、1274年依据仁安本抄录的金泽本以及1276年依据天圣本传录的近卫本。以上三个版本中,除了仁安本已失传之外,近卫本于1761年由猪饲敬所刊成《猪饲校宋本》,金泽本则传至1948年被日本农业综合研究所冠以《金泽文库本齐民要术》之名影印出版。《要术》刻印版最早出现于1744年,当时京都向荣堂出版了由山田罗谷据《津逮本》刊印的第一部《要术》。1826年,浪华书肆定荣堂出版由仁科幹加序的山田罗谷本的覆刻本。明治年间(1868-1911),有邻堂将此书重印出版。1948-1959年,西山武一、熊代幸雄主持完成对《要术》的首次校订译注。1997年,田中静一、小岛丽逸、太田泰弘,再次对《要术》进行编译。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赫茨将《要术》译成德文。《要术》译注工作的开展对于《要术》在海外的

① 虽然有史料表明,《要术》在英法等西欧国家也有传播,但因为只是在一些著作中被部分引用,因此不属于文本传播范畴。

② 除了文中所列抄本之外,还有学者依田惠、医官涩江氏、学士小岛尚质根据高山寺本抄录的传抄本。

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见表 2)。

表 2 《齐民要术》文本海外传播轨迹			
传播时间	传播区域	版本及传播者	传播方式
1166(南宋)	日本	仁安本(不详)	手抄
1274(元)		金泽寺本、金泽实时	手抄
1276(元)		近卫本(不详)	手抄
1744(清)		山田罗谷、京都向荣堂	刻印
1761(清)		猪饲敬所	翻刻
1808(清)		依田惠	传抄本
1826(清)		仁科幹、浪华书肆定荣堂	覆刻本
1868-1911(清)		有邻堂	刊印
1948(民国)		日本农业综合研究所	影印
1948-1959		西山武一、熊代幸雄	校订译注
1997	德国	田中静一、小岛丽逸、太田泰弘	编译
20 世纪 80 年代		赫茨	编译

不难看出,或许是由于地缘优势抑或是因为农业生产条件的诸多相似性,日本成为《要术》海外传播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区域,通过手抄、刻印、译注等多种形式,《要术》文本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相较而言,《要术》文本在日本以外的其他海外地区的文本传播则较为少见,只有赫兹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部分章节的编译工作。

除了文本传播之外,后世农书对《要术》内容的大量引用,也大力推动了《要术》中所记载的农业知识与技术的传播与实践。

2.后世农书——《要术》内容传播最主要的载体形式

作为中国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书,《要术》记述的生产项目很多,包括植物栽培、动物饲养救治、农副产品加工及保藏等等,其中既有对《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前朝农书中所涉及的农本思想、耕作技术、农作物栽培等生产经验的继承,也有对垦荒、轮作、灌溉、油料染料作物栽培、桑树种植、果蔬栽培、牛羊猪及家禽饲养、林木栽培等生产技术进一步的详细介绍,此外,棉花种植、茶树栽培、蔬菜保鲜贮藏、果树嫁接、动物救治、渔业生产、备荒等生产经验也在该书中得到了最早总结。因此,该书被认为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农学巨著。后世农书也多对其所载生产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引用(见表 3)

表 3 《齐民要术》内容传播的主要轨迹			
传播时间	所引农书	传播方式	传播内容
唐	《四时纂要》	直接引用	耕作技术、农作物种植、蔬菜种植、果树栽培、畜牧养殖、林木栽培、花卉种植
北宋	《禾谱》	直接引用	耕作技术、农作物种植、
金	《种艺必用》	直接引用	蔬菜种植
元	《农桑辑要》	直接引用	农本思想、耕作技术、作物种植、果树栽培、蔬菜种植、畜牧养殖、蚕桑养殖
	《王祯农书》	直接引用	耕作技术、作物种植、果树栽培、蔬菜种植、林木栽培
明	《农政全书》	直接引用	农本思想、耕作技术、作物种植、果树栽培、蔬菜种植、畜牧养殖、蚕桑养殖、农业经营
清	《农桑经》	直接引用	农本思想、耕作技术、作物种植、果树栽培、蔬菜种植、畜牧养殖、林木栽培、农
	《授时通考》	直接引用	业经营、蚕桑养殖

当然,除农书之外的其他著作引用,也是《要术》内容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囿于这部分著作数量庞杂,筛选难度大,因此,不在本文关注范围之内。

(二)重农务本、“自上而下”强力推动:《要术》传播主体及其动因

中华民族是崇尚农业的民族,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务本”传统影响深远,形成了“举国重农”的管理体制。“王朝代有更替,但重农传统则循而未改”^①,各级官吏亦以推广农技、发展农业为首要政务。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农学巨著,《要术》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其“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下得到广泛传播。宋朝天禧四年(1016),在利州转运使李昉的请奏下,宋仁宗授权皇家刻印厂(崇文院)将《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校勘后刻印出版,并分发给全国兼“劝农使”的地方行政官,作为他们指导农业生产的根据。元朝至元十年(1273),司农司在广泛吸纳《要术》及前朝其他农书丰富遗产基础上,编纂刻印了《农桑辑要》一书,并分发当时元朝所统治的黄河流域和四川各地。清朝乾隆二年(1737),乾隆皇帝在深感《要术》等前朝农书“诸编嘉其用意勤而民事切”^②后,召集额尔泰、张廷玉等一部分内廷词臣,以《要术》等前朝农书为参考,编撰《授时通考》这部全国性整体农书,并诏旨各省复刻。

此外,除了中央政府,以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精英,也对《要术》在民间的传播表现出极大热情,并成为其传播的主要力量。无论是《要术》的版本刻印、农书引用亦或著作引录,其作者多为地方官员、学者、乡村缙绅、寺庙僧侣等各类拥有较高社会威望的精英人士(见表4)

表4 《要术》传播主体情况一览表

传播方式	传播时间	传播者	版本/著作名称	国别	身份
版本传播	北宋	中央政府	崇文院本	中国	官方
		日本僧人	高山寺本	日本	僧侣
	南宋	张麟	龙舒刻本	中国	九江郡守
		日本康乐寺僧人	任安本	日本	僧侣
	元	金泽实时	金泽寺本	日本	越州刺史
		不详	近卫本	日本	不详
	明	马直卿	湖湘本	中国	伺御
		胡震亨	秘册本	中国	学者
		毛晋	津秘书本	中国	学者
	清	张海鹏	学津本	中国	学者
		袁昶	浙西本	中国	太常寺卿
		黄尧圃、劳格	校宋本		诤部主事、藏书家
		张绍仁、陈子准、黄廷鉴、邵浪仙、张步瀛、刘寿曾、孙诒让、管明佳	转录本	中国	学者
		陆心源	群书校补	中国	福建盐运使
		山田罗谷	山田罗谷本	日本	学者
		猪饲敬所	猪饲校宋本	日本	学者
		涩江氏	抄本	日本	医官
		仁科幹	山田罗谷本覆刻本	日本	学者
		小岛尚质	影印本	日本	医官

① 樊志民:《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② [清]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卷228,浙江书局,1882年。

续表

传播方式	传播时间	传播者	版本 / 著作名称	国别	身份
版本传播	民国	郑国勋、唐晏、倪澄瀛	校勘本	中国	学者
		罗振玉	吉石龕丛书	中国	学者
		日本农业综合研究所	影印本	日本	官方机构
	新中国	石声汉	齐民要术今释	中国	学者
		缪启愉	齐民要术校释	中国	学者
		西山武一、熊代幸雄	齐民要术日译本	日本	学者
		田中静一等	要术日译本	日本	学者
		赫茨	要术德文本	德国	学者
		韩鄂	四时纂要	中国	农学家
		曾安止	禾谱	中国	彭泽县令
农书传播	唐	曾安止	禾谱	中国	彭泽县令
	北宋	吴攸	种艺必用	中国	不详
	南宋	司农司	农桑辑要	中国	官方机构
	元	王祯	王祯农书	中国	旌德县尹
	明	徐光启	农政全书	中国	礼部尚书
	清	蒲松龄	农桑经	中国	乡村知识分子
		官修	授时通考	中国	官方
著作传播	18 世纪	在华修道士	中国回忆录	法国	宗教人士
	1859	达尔文	物种起源	英国	科学家
	1868	达尔文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英国	科学家
	195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英国	科学家

(三)重农思想、农业知识与技术:《要术》历时传播的主要内容

《要术》共计 10 卷 92 篇,内容涉及重农思想、耕作技术、农作物种植、蔬菜果树栽培、林木栽种、畜牧养殖防病、农副产品加工、农业经营等众多方面。首先,传统重农思想在《要术》中得以充分体现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在《齐民要术·序》里,贾思勰指出“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王田,万国作义;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①,并以尧、舜、禹、神农等古代圣帝名王为例,阐述劝民农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在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生活方面的成效,他还多次引用《管子》、《淮南子》等中的重农言论,论证农业为本的思想。贾思勰还列举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秦穆公用商鞅“急耕战之赏”而雄踞各国的业绩,将农业的兴衰同富国强兵之道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凡是有所作为的君主或圣人都“不耻身之贱,不忧命之短,而愧道之不行,忧百姓之穷。”所以统治者应身先士卒,以兴修水利、鼓励农作为首要政务,并认为这就是国家的基础,这些思想对后世重农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重农思想发展中,《齐民要术》可谓是秦汉与隋唐之间承前启后之作。

其次,基于文本内容分析方法,选取直接引用《要术》文本内容的八本后世农书作为分析样本,经过对施引农书的内容比对(详见表 5)^②,不难发现: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术》被引频率呈现衰减之势,符合现代科技文献老化规律,可以用英国学者布鲁克斯提出的指数衰减模型加以解释。该模型认

①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 年。
② 后世农书对《要术》内容的引用情况的比对量化分析,是在相关农书 word 文本数据库基础上,通过关键词查找的方法得出的。

为科技文献被引用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可见作为传统农业时代的科技文献《要术》也具有现代科技文献的传播特征。具体到《要术》而言,文献老化规律的可能原因有:一方面,《要术》之农业技术大多已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后世农书对其技术的引用价值有所折扣;另一方面,随着农书数量增加与农技知识的丰富,后世农书引用选择也在增加,客观上降低了《要术》的被引频次。二是《要术》中所载的包括耕作技术、作物种植、蔬菜与果树栽培、畜牧养殖等在内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受到了持续的关注与大量的引用。其中,耕作技术与农作物种植、蔬菜种植的引用占比相对较高,烹调、花卉种植、蚕桑养殖等的引用占比相对较低。但不同时代其他内容也出现引用占比增长态势,如南宋时期蔬菜种植、清代的蚕桑种植等,这与当时的农事活动特点与政府的推动不无关系。此外,《要术》中所提及的农本思想直到元以后才逐渐引起其他农书作者的关注。三是随着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出现,《要术》中所载的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农业经营等内容开始受到关注。《农桑经》《授时通考》对此项内容的引用字数占总引用字数比重高达 18.8%、13.2%。

表 5 《要术》被引情况一览表

引用 农书	成书 年代	引用字 数占总 字数比 重(%)	引用内容									
			农本 观念 (%)	耕作技术 与农作物 种植(%)	蔬菜 种植 (%)	果树 栽培 (%)	畜牧养 殖防病 (%)	林木 栽培 (%)	农副产品 加工与经 营(%)	烹调 (%)	花卉 种植 (%)	蚕桑 养殖 (%)
四时纂要	唐末五代	18		25	17	10.2	18.9	14.7		2.2	10	2
种艺必用	南宋晚期	12		24.5	50.6	8		13.6				0.3
农桑辑要	元	31	8	27.5	17.5	11.5	13	15			4	7.5
王祯农书	元	8.5		45	24.3	20		8.1				2.6
农政全书	明	4.6	4.6	28	21.8	7.8	7.8	15.6	2.4		5.8	6.2
农桑经	清	8		37.5					18.8			43.7
授时通考	清	3.1	6.7	33.3	13.4	6.7	10	10	13.2			6.7

说明:表中关于引用内容的类型划分参考并借鉴了石声汉先生的《中国古代农书重要内容演进表》。

(四)广泛引用、农业生产行为影响:《要术》历时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既包括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的微观效果,还包括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宏观效果。传播效果是和传播实践结合最紧密的研究领域,人类的传播活动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的,传播不仅是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传承文化、协调社会、维持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流传长达数千年的农学巨著,要准确评估其传播效果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本文参照传播学理论从微观变化与宏观影响两个层面对《要术》的传播效果进行了历史考察,结果发现:

1.《要术》得到受传者的高度认可并被广泛引用

一直以来,《要术》都备受好评^①。南宋李焘称其为“在农书中最峯然出其类”^②;明代王廷相称其为“惠民之证,训农裕国之术”^③;日本学者西山武一赞其为“中国农书的最高峰”^④;同为日本学者的神谷

① 经过对《要术》传播历史轨迹的整体性考察,发现《要术》的传播符合传播的一般性规律,即受传者和传播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的,两者之间时常发生角色的转换,具体而言,参与传播者都经历了一个从受传者到传播者的角色嬗变,因此,本文将对其评价和引用也作为考察受传者态度及行为的依据。

②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02,子部 12,中华书局,1965 年。

③ 杨现昌:《〈齐民要术〉之中外版本述略》,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

④ [日]西山武一:《亚洲农法和农业社会》,东京大学出版社,1969 年。

庆治则认为,“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①;日本农史学家渡部武称其为“集中国人民智慧大成的农书中之雄”^②;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及其助手白馥兰也认为,“《齐民要术》是完整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中国农书,其行文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所述技术水平之高,更臻完美”^③。不仅赞誉有加,《要术》更是受到包括农书在内的后世著作的大量引录。比如18世纪,法国巴黎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纪要》(简称《中国回忆录》)一书的第五、第十一卷中分别介绍了《要术》中关于植物及果树栽培、养羊等技术;19世纪后半期,法国农学家尤金西蒙在其关于中国农业的论著中介绍了贾思勰及《要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两本著作中,先后六次谈论并引证《要术》;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撰写的科学技术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将《要术》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2.《要术》深深影响了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行为

作为一部反映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的南北朝时期的农书,《要术》由于广泛传播,突破了地域限制,对我国乃至海外等众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王思明在《〈齐民要术〉之中外版本述略》一书的“序”中提到:“在作物栽培方面,《要术》中记载的田间选种、单独播种、单独收藏等选种育种方法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甚至作物品种的命名方式依然沿用贾思勰归纳的‘以人命名’、‘观形命名’及‘会义为称’三种形式……在蔬菜种植方面,《要术》中所记载的用‘微煮催芽’来鉴别韭菜种子新旧的方法延续至今……在果树栽培方面,前苏联植物育种家米邱林和美国、加拿大植物育种家培育的寒带苹果,都是用《要术》中提到的海棠果作亲本培育成功的……而现在世界各国的养马业,都继承了《要术》中所载的关于养马、相马、驯马、医马、培育良种等理论和方法。”^④日本研究《要术》专家神谷庆治在《校订译注〈齐民要术〉》的“序文”中谈到:“在日本旱地农业技术中,也存在春旱、夏季多雨等问题,而采取的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⑤而曾经从事过多年农业生产的日本学者山田罗谷总结自己的生产实践后,指出:“我从事农业生产三十余年,凡是民家生产上生活上的事,只要向〈齐民要术〉求教,依照着做,经过历年的试行,没有一件不成功的。”^⑥

综上所述,《要术》不仅获得了广泛而长期的认可,更对后世农业生产行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其传播效果无论是从微观层面亦或宏观层面来看都是显著而明显的。

四、基于系统观的《要术》历时传播的影响因素

考察传播过程是理解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仅仅从过程本身或过程内部考虑问题,还不能揭示社会传播的全貌,只有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系统观看问题,才能科学地把握传播活动的总体。1959年,美国学者赖利夫妇提出了传播的社会系统模式。认为任何一种传播过程都表现为一定的系统的活动,而多重结构是社会传播系统的本质特点。这种结构的多重性和联系的广泛性体现了社会传播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综合系统。换言之,每一种传播活动、每一个传播过程,除了受到其内部机

① [日]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1959年。

② 杨现昌:《〈齐民要术〉之中外版本述略》,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第5分册,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 杨现昌:《〈齐民要术〉之中外版本述略》,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⑤ [日]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1959年。

⑥ 杨现昌:《〈齐民要术〉之中外版本述略》,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制的制约之外,还会受到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广泛影响,《要术》的历时传播也不例外。本文主要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两方面分析《要术》历时传播的影响因素。

(一)传播主体的精英化对《要术》的传播产生了双重影响

由于在古代中国,文字只是被精英阶层学习并掌握,并未在普通民众中得以普及,因此,《要术》的传播主体长期以来都是以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精英阶层(详见表4)。一方面,这有利于传播主体凭借着自身良好的信誉与权威性,增加《要术》在受传者心目中的可信性,有利于《要术》的内容传播;但另一方面,作为传播主体的精英阶层,由于对农业生产缺乏实践,因此在阅读牵涉很广泛的农业知识且充满术语的《要术》时,即便字句通顺,也很难做到完全理解,加之深受世俗的功名利诱,缺乏对《要术》的研究热情,故传播更多表现为“摘章引句”,而缺少基于对其内容理解基础上的传注、义疏,最终导致其“展转诱脱”^①,影响了其传播效果的提升。

(二)传播方式的口语化限制了对《要术》内容的理解与消化,影响了其传播

贾思勰在《要术》“自序”中提到,其写作《要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每事指斥,不尚浮词。”^②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贾思勰写作《要术》的初始目的是指导家人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为了使家人易于理解,采用了与同时期规格化程度较高的文言文的文风不大一样的口语化的写作风格,这在当时应该是有利于对《要术》内容的理解和消化的。然而,口语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会随着社会变迁随时随地发生演变,口语化的文风对于信息或知识的长期传播会造成一定的困难与不便。这一点在《要术》的传播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明末著名文人杨慎在其《丹铅总录》一书中便提到:“……所引古书奇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其犹啜之,况民间其可用乎?”^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它“文辞古奥”^④。游修龄、缪启愉、马宗申、汪维辉等众多学者对《要术》词法的考证与辨疑也从侧面印证了《要术》文辞的艰涩难懂。

如前所述,《要术》传播主体精英化的身份在增强《要术》传播内容可信性的同时,却也因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缺乏了解造成了对《要术》内容理解的困难,影响了《要术》信息的准确传播,而《要术》行文的口语化风格进一步加剧了对其内容正确理解与顺畅传播的难度。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业典籍,《要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凭借着内容的实用性与全面性以及强大而有力的传播主体,不仅获得了高度认可与评价,更深深影响甚至改变了很多地区的农业生产习惯,对世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要术》的传播,不仅使得东亚、欧洲的农业生产技术得以长足发展,而且还冲击了域外文明,甚至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及现代科学的发展。研究表明,《要术》的传播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农学派的建立输送了养分;而达尔文正是以《齐民要术》的论述为有力证据,驳斥了西方把选择原理看成是近代发现的不正确说法,并且从正面阐述了古人如何运用这项原理。《齐民要术》在达尔文经典著作中始终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以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传播主体对农业生产知识的缺乏以及传播方式的口语化特点,也对《要术》的传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当然,我们无法也不能对古人苛求过多,但希望当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推广,能从中获得一些历史的启发与警示。

①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2,子部12,中华书局,1965年。

②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

③ [明]杨慎:《丹铅总录笺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④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2,子部12,中华书局,1965年。